



南通老照片

实业警卫团消防队，一九一九年

海陵旧话

如东县掘港镇商贸发展史略(三)

□刘刚

粮食市井近悦远来

掘港地区由于水源条件较好,利于种植粮食,以水稻、麦子、玉米及杂粮为主,史称“鱼米之乡”。民国6年(1917年),张謇在掘港创办大豫盐垦公司,废灶兴垦,种粮植棉。民国9年修筑公路,开辟南通至掘港的内河航线,通行汽车、轮船,交通方便,商品交换频繁,掘港地区的粮食贸易逐步旺盛起来。“赵、钱、孙、李”四大商号中经营粮食的就有三户,反映了当时粮食贸易的景况。掘港镇西北的海安等地粮食有余,东南的棉区粮食缺乏,前人曾喻为“运不完的西北,吃不饱的东南”。因而掘港就成为粮食贸易的中心市场。据民国6年统计,经掘港输入的粮食就达10万石,食油1万担。粮食大部分来自海安、兴化、泰县、东台等地,部分来自芜湖、九江、无锡、松江等地,江南等地来粮多为粳米,其余均以籼米为主,杂粮为数不多。据查考,掘港历史上曾有一条贯穿镇中心的河道,把掘港划成东南、西北两大片。民国20年前后,掘港周围农村多数靠船舶通行,农民随船带上粮油产品,来掘港换回需要的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,当时的粮船、草船都要进入市河内。除了农船来往外,还有客运船,来自海安、姜堰的米船以及下河船、小生意船等,使市河非常热闹。沿河两岸开设粮行、草行、八鲜行、糖坊、糟坊等商户为数甚多,其中粮食行有15家之多。以后,由于河道变化,这种现象渐成过去。

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诞生的三十多年中,掘港各种商行中以粮行为最多,保持在40家上下,粮行之间存粮悬殊较大,大的粮行有300至500石,一般的100至200石,也有几十石的。其经营方式有三种:一种是有资本、规模大的粮行向外购粮,运回销售;一种是代客户买卖,从中抽取佣金;一种是向本地农民收购,再转手卖出。每当新粮上市,他们就压价收购;到了青黄不接之际,又抬价销售,碰到荒年歉收,更是米珠薪桂。有的粮行还以大斗进、小斗出,牟取暴利,最终总是农民吃亏。所以掘港农民买卖粮食流传着“进出两个九斗五”的民谚。当时掘港粮行中规模较大的要算何信成、王久大、钱仁记、吴恒昌四家。他们以粮食批发为主,兼做零售,其储粮之多、销量之大、获利之厚,令小粮行望而生畏。就拿钱仁记粮行来说,在民国8年到29年的20多年时间里,利用其良好的市口、雄厚的资金、灵活的经营,在掘港粮食贸易上独树一帜、财运亨通。从民国21年的3000元大洋资本起家,发展到民国26年手上共有40万元资金,职员和工人20多人,另外,还有临时雇工。当时民间艺人唱牌儿经也唱道:“钱仁记老板本事好,粮食行里站头号。”又如,创建于明朝末年的永升酒店,利用粮食酿酒,开办糟坊,兼营五洋杂货,并自设碾坊,加工稻麦,前为门市,后是作坊,发展邻近乡镇的批发交易。由于店规严、信誉好,生意兴隆,日增月盛,曾是掘港历史上最大一家商号。抗战前拥有流动资金30万银元、职工40多人,店内仅白酒就正常贮有1000坛(每坛250公斤)。1947年,掘港遭国民党军队侵占。全镇原有粮行33家、存粮4000石以上,这时仅剩下两家粮行、存粮不满两石。五家油坊剩下两家,三个月仅产油20担。新中国成立前夕,粮油购销仍掌握在私人开办的粮行、油坊手中,据1948年10月统计,掘港镇有粮行36家、油坊3家,粮油价格飞涨现象仍然存在。为了稳定平抑市场价格,1954年4月起,国家对粮食、油料全面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,粮油纳入计划供应轨道,市场价格随之稳定。掘港的粮食加工,过去全靠石磨、石臼、石碾等工具,食油则靠用铁锤、木箱等打、榨而得,工效甚低。新中国成立前,掘港加工粮油的油坊、机米坊、砻坊、磨坊、碾坊等总共不过八九家,规模都不大,加工的粮油不够供应当时的掘港市场。民国9年(1920年),由掘港镇张范廉、管甸安发起,兴办柴油机发电,对发展粮油加工业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。此后,刘家油坊第一个使用机器榨油,扬记电厂也第一次用电碾米、榨油,这些都曾在旧日掘港商贸业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。

崇川往事

郑板桥《如皋袁氏家乘序》是伪作

□徐继康

袁姓为袁庄之著姓,自明成化初年由扬州迁居如皋东四十里之地(今如东)以来,其子孙繁衍蕃庶,大河两滨,一姓之聚而居者,为袁氏其地,因名袁家庄。清乾隆年间,袁氏曾数修家谱。民国二十年(1931)又增补了新内容,编就《袁氏宗谱》并印行于世。谱中仍置数篇旧序于卷首,作序者石湘、顾云、范承宣等人皆是皋邑名宿。

其中有郑板桥《如皋袁氏家乘序》一篇,最为醒目,全文如下:

从来国有史以示劝惩,家有谱以别尊卑。谱□(按:原文缺损处以□代替,下同),为义大矣哉!余素闻如皋袁氏为望族,顾慕其名而未亲见其人。乾隆乙酉,桥门与余同客古丰文园,接谈日久,始知其详。桥门因素撰谱序,同气之命,难以不文谢。于是述其世次,考其行谊。盖袁氏起自妫水,望出濮阳,卧雪清操,扬风惠政,代有名贤,指不胜屈。延及胜国,锦衣校尉□公与余邑李首揆贤,患难相契,随驾北庭,经□险阻,维持保护,至于旋轸,则公一人之力居多。都指挥门达,有宠嫉公,谋排下狱,旋调公南京,后门达谪戍,召复旧职,公饯达如礼,不念旧恶,时皆以为难。上北至小黄河苏武庙,哈铭与公常宿御寝傍,上因与公言光武严子陵共事事,曰:“汝今日与子陵一般。”喜宁不欲,上还京,忌公,诱出营,将杀之,上急救之,乃免。宪宗即位,□人阁公,晋公爵。以勋高位隆,急流勇退,率子宝一、宝二、宝三备倭扬郡西山,遂迁如皋。后次君于海陵立基,季君于崇川创业,今皆科第不绝。而长君居皋,承先启后,亦复屡代迭兴,人口蔚起。其一家之善行善状,岂笔舌能罄哉?□有之留,冬日之慈祥,殆袁氏之根本欤?因援笔而为之序。乾隆三十年乙酉荷月上浣,赐进士出身、勅授文林郎、前任山东范县知县加三级,兴化年眷弟郑燮板桥氏顿首纂。

序文中述说袁氏迁皋始祖袁彬生平之事略(关于袁氏迁皋始祖是否是袁彬,另文考述),并言及写序时间、地点及缘由,乃乾隆三十年(1765)郑板桥与袁桥门(即袁氏十四世孙袁缙)同客于丰利汪氏文园,接谈日久,故知袁氏之来龙去脉。时袁桥门将撰《袁氏家乘》,因而求序。同气之命,郑板桥欣然命笔,援笔写下此序。

郑板桥曾于乾隆二十五年六月来寓文园,之后并没有再来过丰利。众所周知,郑板桥是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卒于兴化城内升仙荡畔之拥绿园。而根据这篇序文的记载,郑板桥写此序在此年六月上旬,距其去世时间仅隔半年,且时在文园,此说过于离奇。

此序不载于《郑板桥全集》,虽说郑板桥有不少文章未收入全集,佚文佚诗并不少见,但此序的行文太过平庸,与郑板桥平日那风

趣泼辣的文风迥然不同。

不由让人疑窦重重。

确好民国《袁氏宗谱》中,也刊有袁缙《初刻家乘序》一篇,正是说他求序的前后经过,可补郑序之不足:

余幼习儒业,二十三岁见知桐城张宗伯,乾隆乙卯、辛酉两入乡闱,不遇,病且随之,缠绵廿载,尺书寥落,今齿登六十,名利未就,上忝父祖,下愧儿孙,空生天地,怅也何如。忆廿七年秋,客姑苏寒山寺,遥望千峰万岭,黛点螺浮,古庙危楼,钟鸣磬澈,乃心悄然,感极而悲,想大丈夫不得志于时,山林其藏身,所也。遂有逃俗归空之想。旋于中夜见东南云际有乘鹤而来者,纶巾道服,黄发银须,飘然至前,则余先严也。余悚然伏地,先严正色言曰:“我袁氏来皋日久,家乘遗亡,每思重辑,又苦蹉跎未举,此我之所遗恨者尔,宜速为图之,无寻别念。”余唯唯,已而惊觉,乃是一梦。遂起,别山僧,买舟返皋。适古丰汪璞庄有书相邀,乘便东抵文园,楚阳王竹楼、郑板桥,七闻黄鹂,江南王春明、李琴夫,邗上药根僧皆在焉。花晨月夕,诗酒盘桓,见风流名士无有出板桥者,因请为序,以弁谱首,板桥欣然应之。携序归来,葬诸家笥,而立谱之心愈益,怦□愧,无欺黄之笔,又乏削删之资,以故仍迟三十五年夏,幸吾族鉴玉、天和诸兄劝谕宗人量力捐资,始克镌印传后,而先严之遗憾,遂由此而稍纾焉。特予小子,笔墨久荒,不任操觚,为足增忏愧耳。他时再过文园,与竹楼诸君子遇,未知其能曲宥焉?否也。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冬日,十四世孙缙顿首百拜谨识。

按袁缙的说法,乾隆三十年六月,他接到汪之珩的手书,前访文园,其时兴化王国栋、郑板桥,福建黄慎,无锡王灏,镇江李御,扬州药根和尚等人都在,他们一起诗酒唱酬。在日夕相处的过程中,袁缙发现郑板桥是一位风流自赏的真名士,十分钦佩,因请为即将编撰的《袁氏家乘》作序。郑板桥欣然应允,就在文园写下此序。袁缙携序归来,着手编纂《袁氏家乘》。编好后,由于缺少资金,没有及时刻印。乾隆三十五年,袁鉴玉、袁天和劝谕袁氏宗人量力捐资,家谱方才得以刻印传世。乾隆三十七年冬月,袁缙撰写了这篇序文,述说修谱及求序的前后过程。

袁缙这篇序文,同样是漏洞百出。

首先,乾隆三十年六月,郑板桥根本不在丰利文园,不仅仅是郑板桥,黄慎、王灏、李御、药根和尚等人都不在。黄慎曾于乾隆二十年秋与乾隆二十一年春两次来过文园,在乾隆二十二年回到故乡福建宁化后,再也没有回过扬州,没有回过文园。李御是镇江丹徒人,是文园六子之一,其早年经常往来于文园。但自从乾隆二十六年他应王文治之邀赴

京师后,也再没有来过丰利。王灏在乾隆三十年倒是来过文园的,不过不是六月,而是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五日,汪之珩妻子黄氏过五十岁生日,即将以拔贡人都应试的王灏特地赶来祝贺,住了五六天后离开。扬州祇园庵僧药根和尚曾与文园往来,不过那是乾隆十九、二十年间的事了。袁缙文中所列举的这几位文园诗侣中,当时仅有王国栋在丰利。

文园主人汪之珩的内弟黄瘦石记有《斜阳馆日记》,他于乾隆三十年五月二十六日下榻文园至六月十九日离开。这些天,黄瘦石寓居文园,故文园所发生的小事情,皆记录在案:

(五月)庚子,下榻文园之近水楼台。

(六月)丙午,周检斋奔(自注:检斋字春来,江宁人,受饶八子,盖今之二手棋也)。

丁未,竹楼自耕茶来。

戊申,李砥斋作《斜阳馆图》。

癸丑,片石至。

甲寅,汪使君舟中有女抱疾,赠药疗之,竹楼、蠹白、片石皆有诗赠,亦和一首。

戊午,天气亢旱,禾苗枯槁,各邑建坛祈雨,古丰亦禁屠宰黄,黄冠设醮。片石去。

癸亥,到家,雨二寸。

读此可知,这个月来文园的有王国栋、黄瘦石、李国柱、汪文辉、江干、周检斋、管涛等人,并无袁缙序文中的黄慎、王灏、李御与药根和尚。此段“日记”我选至癸亥日即六月十九日,黄瘦石离开文园,其后所记的是他归柴湾之后的生活。可以肯定,郑板桥这个月绝对没有来过文园,如果来,黄瘦石是无论如何也要留下来陪这位对他“青眼有加”的郑老前辈的。

袁缙序文的第二个破绽,他署写此序的时间是乾隆三十七年冬月,在文章的最后,他还说有空将再访文园,把《袁氏家乘》带给王国栋诸君子看看,看他们能不能宽容自己的才陋学浅。要知道,自从乾隆三十一年五月汪之珩去世,是年底《东皋诗存》刻就之后,文园诗友便陆续离开了丰利,有些人再也没有回到文园。袁缙此说与事实严重不符。

最大的矛盾,是来源于这本《袁氏宗谱》,在卷四《世表》中,有关于袁缙的记载:

缙,大礼长子,字综五,号桥门,文庠生,康熙甲午四月初六生,乾隆丙子十月十一卒。

乾隆丙子即乾隆二十一年,袁缙就已经去世,何来乾隆三十年访文园求郑板桥序?又何来乾隆三十七年欲再访文园之说?

前后通读,对照历史,郑板桥《如皋袁氏家乘序》与袁缙《初刻家乘序》皆伪作无疑。究其原委,无非《袁氏宗谱》编纂者“见风流名士无有出板桥者”,巧借郑氏曾去过丰利文园之往事,故意臆造名人手笔,以为家族增色,但由于对当时事实不甚清晰,反而弄巧成拙。

为了面子而丢了面子,今人如是,古人亦如是。